

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校注

中州名家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谢灵运

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校注

中州名家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州名家集
谢灵运集校注

顾绍柏 校注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32开 19.375印张 420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48-0085-4/I·43 定价5.70元



谢灵运像
(据《三才图会》)

謝靈運

述祖德詩二首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段生潘魏國展季救魯人
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
臨組作不練對珪寧肯分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蒼蒼歷千載遙遙播清塵
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委講經道論攻服康世屯
屯難既云康尊主陪斯民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地
萬邦咸振懼橫流賴君子
拯溺由道情龔暴資神埋秦趙
欣來燕魏遼文軌賢相謝
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
州外拂八五湖襄隨山疏
濟澤德品藝分粹遺精捨
塵物貞觀

宋嘉泰年間刻本《三謝詩》

(故宮博物院影印，原刻本已流落國外)

謝康樂集卷之



宋陳郡謝靈運撰

謝靈運

明馮李沈啓原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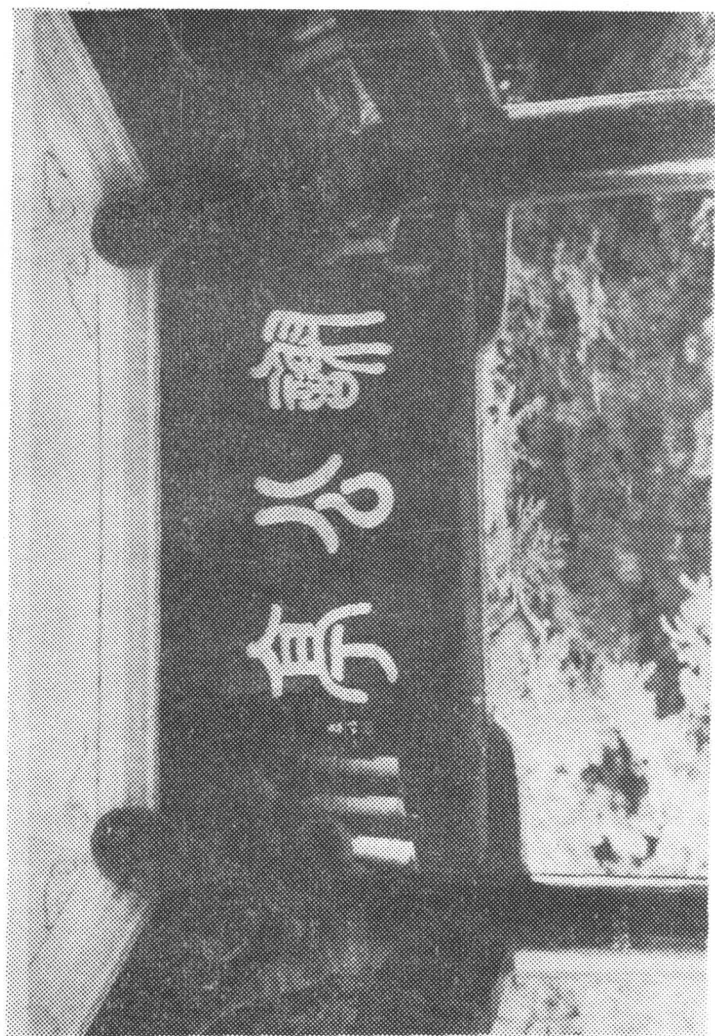
秣陵焦 竑校

賦

山居賦

注自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
曰丘園在郊鄣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
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



謝公亭上橫匾



江心屿上之谢公亭（相传灵运曾登亭观景，故后世取名谢公亭。自唐迄清，屡有兴废，现亭为1952年重建）

前 言

在文学史上，常有这种现象，某些有影响的作家，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在他们死后常难得到正确评价，或扬之过甚，或贬之过低，失却本来面目。跨晋宋两代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是属于这类人物。特别要指出的是，过去由于某种政治需要，灵运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为人，有时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骂他为“小人”者有之，骂他“以文辞欺人”者亦有之，这是很不幸的。今天我们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整理，目的就是要给人们一个完整印象，以便把他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进行综合研究，从而确立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

谢灵运生于东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死于南朝宋元嘉十年（公元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出生地为会稽郡始宁（今浙江上虞县南、嵊县西北）。十五岁由钱唐（今浙江杭州市）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居乌衣巷。袭封康乐公，授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东晋义熙元年，灵运二十一岁，任琅邪王大司马行

参军，始入仕途。义熙二年，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灵运于是年或稍后任记室参军。七年，刘毅改任江州刺史，灵运亦随往。八年，毅任荆州刺史，灵运改任卫军从事中郎，随往江陵。毅反刘裕，兵败自杀，灵运改依刘裕为太尉参军。次年还都，任秘书丞。十一年，任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后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十四年，刘裕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建宋国，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灵运由彭城返京，任世子左卫率。次年，刘裕建宋朝，东晋亡。灵运由公爵降为侯，任太子左卫率，不得意。永初三年，刘裕死，少帝即位，灵运不为权臣徐羨之、傅亮所容，出任永嘉太守。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元嘉三年，宋文帝诛徐羨之、傅亮、谢晦等，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寻迁侍中。然仍无实权，于是同在永嘉一样，擅离职守，肆意遨遊。文帝讽旨令自解，灵运乃托病回始宁，第二次过着隐居生活。寻免官，时元嘉五年。八年，灵运请求决湖为田，与会稽太守孟顗构成仇隙。顗表其有“异志”，灵运急驰京师申辩，文帝不予追究，但也不让他再回会稽，而使其出守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他在临川依然荒忽政事，尽山水之乐，遂为有司所纠。司徒刘义康遣使收灵运，灵运兴兵拒捕。于是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十年，据说灵运与农民谋反事有牵连，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纵观灵运一生，他基本上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他

隱而又仕，仕而复隱，仕不专，隱难久，不满，反抗，直至酿成大悲剧。

说到反抗，或许有人以为我是故作惊人之论。一般认为世家大族不仅与农民阶级水火不相容，就是同统治阶级内部的中下层也存在着尖锐矛盾，这样的人有什么反抗精神可言呢？

《宋书》本传说他与农民造反者有联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那倒是抬高了他，按情理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觉悟，走得那么远。所谓“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如意之后，功劳是同”云云，不过是当权者为了杀害他而编造的口实，其手法拙劣之极。但他对现实的反抗却是实实在在的。《南史》卷十九灵运传论说他“猖獗不已”，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反抗不止。他常常做出一些越出名教轨范的事，在朝堂，举止“多愆礼度”，在日常生活中，他爱标新立异，“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宋书》本传）。第二次隱居故乡时，曾与隱士王弘之等人到会稽郡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太守孟顛知之，以为不成体统，派人加以制止，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南史》卷十九灵运传）这种蔑视封建礼法的举动不可谓不大胆！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看做是一般士大夫在生活中的放荡不检，它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宋葛立方说：“武帝、文帝两朝遇之甚厚，内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为不逢矣，岂可谓‘与世不相遇’（白居易诗）乎？少须之，安知不至黄、散，而褊躁至是，

惜哉！”（《韵语阳秋》卷八）这是一种迂腐之见。大凡有才能的士人，都有远大抱负，他们所追求的与其说是高官厚禄，不如说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种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灵运也是如此，他虽有文才，但并不满足于仅做一个文士。在宋武帝时，“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宋书》本传，下同）文帝时，他任秘书监，寻迁侍中，地位不算低，但不能参与机密，颇有怨气。前者表现为“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无所顾忌地把矛头指向徐羨之、傅亮等实权人物。后者表现为消极对抗：文帝要他撰《晋书》，他敷衍一下，“粗立条流，书竟不就”；任职期间，又“多称疾不朝直”，擅自出遊，数日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这些都说明他不是嗜禄之徒，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

灵运的远大抱负，在其诗文中似乎没有具体谈到，但并非无迹可求。乐府诗《长歌行》不无感慨地说：“臺臺衰期迫，靡靡壮志闕。”这“壮志”指什么呢？《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写到：“李牧愧长袖，郤克惭跣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或可为注脚。这些历史人物尽管有严重的生理缺陷，由于受到人君器重，都能做出一番惊天伟业，而自己却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他还不止一次地称颂其祖谢玄龕定淮南之功，这虽有

矜夸门第之意，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情志寄托。还有义熙十三年写的《撰征赋》、元嘉五年写的《劝伐河北书》等，都表示了他对国是民瘼的关心，对混一文轨的向往，说明他并非只是怡情山水，超然方外，也有壮怀激烈的时候。这与他的同时代人陶渊明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

灵运在现实生活中多次碰壁，抱负始终不能实现。可悲的是，他未能找到碰壁的真正原因，总以为让名位素不逾己的人忽然窃据要津，是一种反常现象。他眼睁睁地看到，象徐羨之、傅亮、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这些曾是默默无闻的人，一个个成了朝廷重臣，而自己却投闲置散，只能弄弄文笔，让皇上开心。他对此迷惑不解，无法找到正确答案。

有人认为，灵运之所以得不到重用，是因为刘宋王朝采取了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有的历史学家也认为，刘裕多选寒门为辅佐，士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诚然，刘宋立朝伊始，便降先朝封爵，灵运也因此由康乐县公降为康乐县侯，但刘宋政权的支柱除了一部分新贵，主要的也还是门阀士族。再从用人来看，谢晦和王弘是武帝的肱股之臣，王昙首、王华、殷景仁、谢弘微是文帝的腹心，他们都属声势赫奕的名门望族。这些人何以能平步青云，唯独灵运仕途蹭蹬？这不能不涉及到武帝、文帝的用人标准。政治或军事方面的才干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标准，但在打根基、创帝业过程中是否竭尽忠诚，则是二帝首先要考虑的条件。王弘、谢晦、王昙首、

王华、殷景仁、谢弘微等正是具备这个条件，而灵运却不具备。义熙初年，灵运大概是凭着从叔谢混与刘毅的交情，做了刘毅的记室参军，此便成为他后来屡遭颠蹶之源。刘毅是与刘裕同在京口举大义讨桓玄的人，逐渐掌握了兵权，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史书说：“毅爱才好士，当世名流莫不辐辏。”（《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义熙五年）刘毅对包括灵运在内的士人是有吸引力的，他们纷纷投靠毅，自然是希望他有朝一日得志，自己也能一展宏图。但是毅武功不竞，权位亚于刘裕，因此心常怏怏，暗中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等深相勾结，作反刘裕的准备。后来刘毅任荆州刺史，到了江陵，以为据上流，扼要塞，可与刘裕一争雄长，遂加紧战争准备。对于刘毅的用心，刘裕早有觉察，待毅在荆州还没完全站稳脚跟的时候，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之。谢混等人也先刘毅在建康受诛。刘毅之败，对灵运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所谓抱负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尽管刘裕对他多年追随刘毅不予深究，并采纳申永所提“除其宿衅，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的建议（见《宋书》卷九三《宗炳传》），授以太尉参军，对于他的文才也很赏识，以后还时有升迁，但在政治上并不委以重任。文帝时，灵运作为一个著名文士，所受到的待遇还要好些，《宋书》本传说，“日夕引见，赏遇甚厚”，大概不是夸张。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既然仕途不通，抗争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走另外一条道路。

逃避现实，栖隐山林，是谢灵运反抗的又一种形式，今天，人们通常把这叫做消极反抗。古代士人视此为最高品德，当他们在政治上失意后，多引陶渊明为同调，从他的诗文中吸取精神营养。但颇不以谢灵运为然，认为灵运之隐乃假隐，是一种故作姿态，因而不能称做隐士，甚至连他曾经当过隐士这一点也不予承认。这实在是一种很深的误解。如果我们不对隐居这种社会病态作过高的评价，那么就应该承认，灵运不仅有浓厚的隐逸思想，而且在他一生中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过着隐居生活或名仕实隐生活。

我们来看看他离永嘉郡所写的《初去郡》诗：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或可优賚竟，岂足称达生。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无庸方周任，有疾像长卿。毕聚类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装反柴荆。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度将迎。理棹遄还期，遵渚鹭修珂。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寡落英。战胜羸者肥，止监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再看他元嘉五年在由建康往故乡途中写的《入东道路》诗：

整驾辞金门，命旅惟诘朝。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飙。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陵隰繁绿

杞，墟囿粲红桃。鹭鹭翠方雉，纤纤麦垂苗。隐
辵邑里密，缅邈江海辽。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
高。鲁连谢千金，延州权去朝。行路既经见，愿
言寄吟谣。

这两首诗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种冲出牢笼、回到大自然怀抱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从景平元年秋到元嘉三年春，又从元嘉五年春到元嘉八年，灵运住在故乡始宁，他过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隐居生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与接交者不是达士，就是高僧。总的说来，他对这种不受管束的生活是颇感满意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读着这些，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二者所表达出来的情致何其相似！

第二次隐居生活似不如第一次惬意，这主要是由于好友相继凋散，自己总感到孤独寂寞。这一时期的诗常抒写一种离情别绪，调子比较低沉。这当然不能被看成是对隐居的动摇，相反倒说明他对现实更加厌恶，对隐逸的追求更加执着。元嘉九年，他在被迫往临川任内史途中，作

《道路忆山中》，回忆了过去的两次山居生活：“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阴倚密竿。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暖。”他是含着悲愤的眼泪遥向故乡告别的。他意识到，那种甜蜜的山居生活，对他来说已是东逝川流，无可追回了，只能深深留在记忆里。

他在始宁期间过的是隐逸生活，通过以上分析，看来不会有什么怀疑了。但两次任郡守是否也算隐逸生活呢？我以为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不仅史书提供了依据，而且有他的作品印证。这两次任职都是违背本心的，只是因为诏令不可抗，只好强就，但他已想好了对付的办法，那就是名仕实隐。且看他在永嘉郡的表现：“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这种过份举动不是突然的，在他还未到达郡境的时候，即暗自下了决心，把这次外任当做体验隐者生活的机会。《富春渚》诗说：“久露干禄请，始果返遊谿。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初往新安至桐庐口》诗说：“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远协尚子心，遥得许生计。”《七里濑》诗说：“遗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这最清楚不过地说明隐逸思想已占主导地位，所以后来才有那些与隐居无异的举动。